

中国考古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三十三号

中国考古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 杨泓, 朱岩石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161—8726—5

中国考古学 (九卷本)

I. ①中… II. ①杨…②朱…③中… III. ①考古—研究—中国—三国时代
②考古—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272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特约编辑 张 静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3.75
插 页 21
字 数 1015 千字
定 价 3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 SERIES

TYPE A NO. 33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Three - Kingdoms to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s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ijing

2018

《中国考古学》（九卷本）为
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内 容 简 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起始于东汉建安年间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权实际形成，自此古代中国从大一统进入长期分裂混乱的格局，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全国，长达四个世纪之久。此时也正是自汉至唐之间的漫长的过渡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从三国分立到隋朝统一，中间只是在西晋王朝灭吴后有 36 年短暂的统一，其余时间都在分裂和战乱之中。同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由民族迁徙引起的移民狂潮，众多古代少数民族内迁中原北方地区，北方的汉族又大举渡长江南徙，挤压许多江南古代民族向东南移动。还有西域人士经由丝路内迁归附华土。汉族传统文化与内迁的众多古代民族文化，甚至外来文化，不断接触、碰撞、争斗乃至溶合，使中华文明步入更加灿烂光辉的新阶段。辉煌的汉文化，经过这一段漫长、痛苦而又生机勃勃的过渡时期，孕育出更加辉煌的站立在当时世界文化巅峰的唐文化。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学，正是用田野考古获得的有限遗迹和考古标本，努力反映和解析这一伟大历史过渡期的历史与文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是《中国考古学》（九卷本）的第七卷，这卷的内容，主要是综合介绍 20 世纪、主要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迄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成果。重点介绍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城市（以都城为代表）遗迹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究明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的墓葬发掘工作，也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还对壁画墓的艺术价值予以特别关注。由于这一历史过渡时期在文化上与前不同的特点，佛教考古与石刻和简牍文书的研究，在本卷中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阐述。并选择从考古标本能够阐明的几个侧面，阐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本卷尽量依据有限的考古发掘成果，构筑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的学科体系。对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汉唐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历史，特别是物质文化的发现，进行还原和解析。

本书适合研究历史、考古、文博和艺术史的专业人员及广大历史、考古爱好者阅读。

《中国考古学》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 巍 王立邦 王仲殊 乌 恩 卢兆荫 白云翔 任式楠
刘庆柱 齐肇业 安志敏 杨 泓 张长寿 张显清 陈星灿

《中国考古学》编辑出版工作组

组 长 白云翔

副组长 巩 文 张 静 李 森

组 员 张孝光 韩慧君 刘 方 季连琪

《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主编

杨 泓 朱岩石

《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撰写者（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飞峰 韦 正 孔祥星 朱岩石 齐东方 刘振东 汪 勃
沈丽华 陈 凌 杨 泓 李 肖 李裕群 郑 岩 赵永洪
赵 超 段鹏琦 魏存成

《中国考古学》总序

20 世纪是考古学传入并诞生于中国的时代，是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发展和继续发展的时代。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学者们，曾经就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现、研究及其在 21 世纪的进一步发展，进行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历史发展的主要参与者、见证者。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当今中国国家级惟一的考古科研机构，将百年来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作一回顾、总结和研究，并对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作一展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基于上述考虑，1996 年我们考古研究所审时度势，提出编著《中国考古学》计划，通过充分论证，这一计划先后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以及“十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中国考古学》各卷分别对不同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研究。从总体来看，20 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大致划分为近代考古学传入时期和中国考古学诞生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与继续发展时期等几个阶段。

1. 近代考古学传入时期（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 20 年代）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随着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文化渗透也接踵而来。这种文化渗透的表现之一，就是外国人到中国的“寻宝”活动。他们采取的形式大多是以探险队、考察队名义进行活动，其中欧美国家的探险队或考察队多在我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西北地区活动，日本的探险队、考察队多在我国东北地区和台湾等地活动。上述活动，一方面使大量中国古代珍贵历史文物被劫掠到国外，另一方面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也随之传入中国。

这一时期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和“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的重大发现，成为中国学术史从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重要契机；使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走出的“疑古”学者们，看到了“释古”（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考古”的科学曙光。考古学成为学术界倍加关注的新科学。

2. 中国考古学诞生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促使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发展为“古器物学”，继之“古器物学”又发展为考古学。

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两千多

年的封建专制统治,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给中国带来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这为此前传入中国的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科学史来看,考古学是在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诞生的,更具体地说考古学的出现是近代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在当时“科学救国”思想影响下,近代中国科学,尤以地质学、古生物学成就最为突出。由于地质学、古生物学与考古学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时已有一批在国外学有所成,在国内业绩卓著的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成为了最早涉足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家;还有一批中国学者,虽然其学术背景不尽相同,但他们都积极投身中外合作考古活动或中国人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这些都为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创造了人才条件。同时,一些受聘于中国科研机构或政府管理部门的国外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等,通过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把西方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介绍、传播到中国,从而为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创造了科学条件。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众多,如旧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渑池仰韶村、山东历城龙山镇等史前遗址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大规模勘探与发掘等。1928年由中国国家学术机构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通过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西方考古学中的地层学、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中得到运用和发展,一些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得以应用。由于当时中国境内的不少考古工作采取了国际合作的方式,使刚刚在中国诞生的考古学获得了“跨越式”发展。

3. 中国考古学形成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后不久,中国学者就成为了本国考古学的主力军。这一时期开展的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小屯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三叠层遗址)、安阳殷墟宫庙基址和王陵区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获得重大学术成果,为建立黄河中下游史前文化和早期国家的考古学文化框架奠定了基础。从学术的时空两方面来说,它们为中国考古学向早晚两方面的拓展和由中原向周边地区的发展,寻找到了科学的支撑点。中国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的长时期、大规模的成功考古发掘,为东亚和东北亚地区古代都城遗址、大型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探索出一条成功经验。

中国考古学在其幼年时期取得的成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正是利用安阳殷墟考古资料和两周金文资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4.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面临极好的机遇。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坚持以田野考古为基础,使学科得到健康发展。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文物考古行政管理机构,成立了国家考古科研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应全国考古工作急

需,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证。作为中国考古学学术园地的“三大杂志”——《考古》《文物》开始创办,《考古学报》更名复刊,它们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

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主动配合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积极开展文物保护、考古勘探与发掘,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考古资料,为此后中国考古学学科时空框架的建立,考古学方法、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这一时期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和陕西蓝田人等考古发现,使古代人类在中华大地上的活动历史上溯了百万年,活动地域大大扩展。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的发掘,丰富了仰韶文化内容,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史前聚落考古方法、理论的最早的成功探索;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发现,找到龙山文化源头;冀南、豫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河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山东的北辛文化、岳石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向早晚两方面延伸。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的发掘,引发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理论认识上的飞跃。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二里冈遗址等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址的考古勘察与发掘,使以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以前的早商文化和夏文化,得以确认。春秋战国时代和秦汉至元明时代的都城、王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连同先秦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再现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构建起了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基本框架。

夏鼐领导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率先积极、主动地将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其中尤以碳十四实验室的建立和年代学的成果最为突出,在体质人类学、古动物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与冶金、陶瓷、古植物学等方面的科学家合作,在古代遗存的物质结构分析、古代作物的研究等诸多方面多有收获。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朝气蓬勃发展的新中国考古学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往往是在遭到巨大的破坏之后,人们对过去认识得更深刻,对未来审视得更清晰,人类社会将出现更大、更快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的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发展等诸多方面,为中国考古学其后的“起飞”准备了条件。

5. 中国考古学的继续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同样也吹响了考古学继续发展的号角。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的发挥,国家对科学研究的经济支持力度大大增强,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与交流的良好环境已经出现。这一切为中国科学的发展,自然也包括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主要有:在安徽、重庆、河北等地,早期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了更多的石器出土地点,个别地点还出土了人骨化石。这使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可望上推到距今200万年左右。广西、湖南、江西、河北、北京等地的距今1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使中国境内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推进至距今10000~12000年。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河南舞阳贾湖等新石器时代中期一些大型史前聚落遗址的发现或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辽宁、浙江、湖北、四川、安徽、河

南、山西、湖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祭祀遗址或城址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对探索中华民族的多元考古学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早期夏文化的探索，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等，使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的“三代考古”学术成果异彩纷呈。秦汉至元明时期的考古发现，如帝王陵墓及陵寝建筑遗址、历代都城遗址、石窟寺与佛教寺院遗址、古代瓷窑遗址等勘察与发掘，使秦汉至元明时代的考古学内容更为充实，学科框架更为完整。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周边地区广泛进行的考古勘察、发掘，使不少地方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得以初步建立。一些周边省区已经建立了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学科框架得以基本构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们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考古学学科框架、谱系基本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以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为基本方法，吸收国际考古学界的先进方法、理论，大规模地开展了聚落考古、城址考古、祭祀遗址群考古以及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手工业遗址考古和古代大型建设工程遗址考古等。与此同时，考古学广泛利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如多种测年手段的使用，DNA 遗传技术的应用，食性分析的探索，环境考古学的引进与创立，计算机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及等，这些又使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加“微化”、更加“细化”、更加“量化”、更加“深化”，也就是考古学的更加科学化、现代化。考古发掘与研究向“大”和“小”“广”和“深”两极的发展，使考古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在科学研究的学术舞台上充分地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地位。

通过《中国考古学》对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回顾、研究，使我们看到考古学百年来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看到考古学在中国所取得的辉煌学术成就，看到年轻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世界所倍加关注的现实。中国考古学已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科之一。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任重道远。本书进一步指出，中国考古学在 21 世纪要取得更大发展、进步，我们还必须全面、准确、科学地把握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必须明确新世纪我们的学术使命。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具有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古代文明国家，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有的考古发现只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开展。已经进行的考古工作在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不同时代的考古学学科进展也不一样。至于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方面，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考古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多年来，由于考古工作者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配合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相应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加强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建设是目前及今后中国考古学学科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学科的发生、发展是与学科理论建设密切相关的，学科成熟的前提是其理论的完备与彻底。学科在发展，学科理论也在发展，因而学科的成熟、理论的完备与彻底也都是相对而言的。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学科理论的存在与不断发展。理论是对学科科学规律的探索，对学科过去而言是学科的科学总结，对学科未来而言是学科的科学假设。学科理论涉及学科的诸多方面问题，如人类起源的一元与多元问题，人类起源一元说与基于传统的地

层学、类型学研究所形成的考古学文化的科学整合问题，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模式问题，早期国家功能问题，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关系问题，社会生产分工问题，考古学文化与血缘集团（血缘社会单位）、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等。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方法论的创新，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考古学要不断发展，就要不断创新其学科“方法论”。地层学、类型学是近代考古学将当时的地质学、生物学学科基本方法“移植”过来的，一百年多年来，它们对于考古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正如现代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是伴随着碳十四、热释光、古地磁和 DNA 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而获得进步一样，地质学、生物学的科学研究，如果至今仍然仅仅停留于使用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上，现代意义上的地质学、生物学则无从谈起。既然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是源于地质学、生物学的，那么借鉴现代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经验，对于当今考古学的发展，学科方法的现代化、科学化、多样化同样是至为重要的。

21 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更加广泛应用，将使基于“考古学文化”提出的“相对”时空框架、谱系，加速向“绝对”的时空框架、谱系发展。诸如碳十四断代及 AMS、古代树木年轮、古地磁法（PM）等断代技术，生物遗存分析和物理、化学对古代遗物的物种、物质成分的分析技术等，都使考古学资料的时空研究提高到更高的科学层次，其中不少是传统考古学方法所无法解决的。我们应看到各种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所带来的考古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其进一步深入发展还必须加强与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对于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而言，多学科结合、多种方法应用是新世纪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考古学文化主要以“特定类型的器物”——陶器与相关物质遗存所构成的“特定关系组合遗存”，体现人们的生产活动、物质生活。自然环境和地理是考古学文化形成、发展的主要条件和背景。马克思曾针对这种由于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指出：“不同的共同体，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发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以，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成物是不同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我国国土广大，各地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不同，有的差别很大。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各地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对于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而言，在考古学研究方法上必须更加关注环境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地关系”。

20 世纪以后的中国考古学发展，还涉及许多考古学理论、方法问题，都是极具时代挑战性的，有的已在本书中进行了探讨。至于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自身发展，要做的工作就更多了，如学科在时空两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发展不平衡性问题，即不同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的不同，不同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情况不同，等等，在本书的相关部分也会谈到，此处不再赘述。

《中国考古学》共设九卷，包括《绪论卷》《旧石器时代卷》《新石器时代卷》《夏商卷》《两周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和《宋辽金元明卷》，各卷分之可独立成书，合之为有一有机整体。参加撰写的学者多达五十多位，其中大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同时我们还聘请一些所外专家，参与了本书的部分撰写工作。作为一项集体性项目，本书涉及全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因此我们要求作者在现有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在撰写中要突出科学性、全面性、客观性，同时更要有创新性。鉴于考古学著作编写出版的复杂性和难度，我们专门设立了编辑出版工作组，协助编委会负责有关技术性和事务性工作，以求把本书编写出版为精品。尽管如此，对于这样一部几十人参与撰写，又涉及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内容如此之泛、问题如此之复杂的庞大著作，其中的不足或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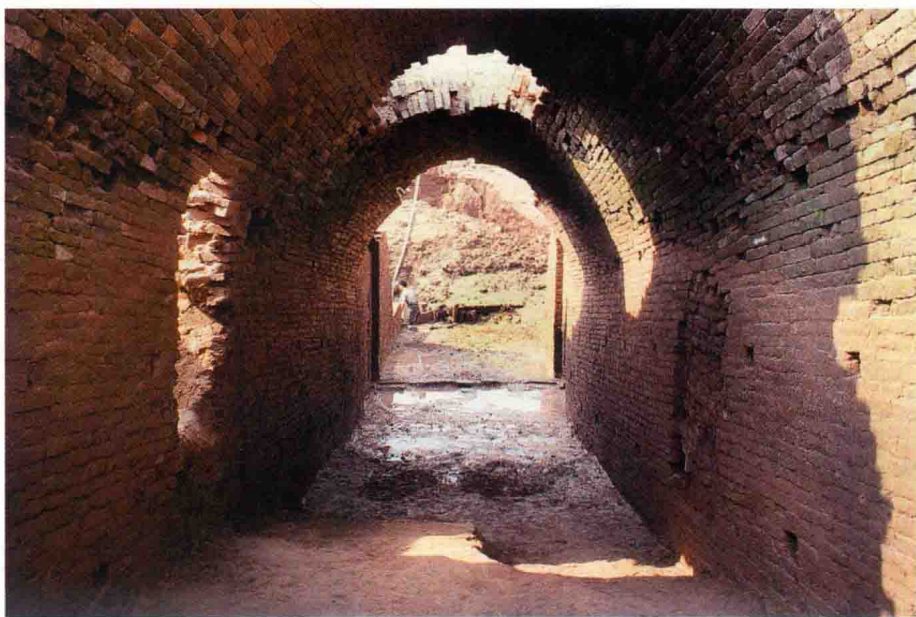
《中国考古学》的编写出版，是在本书编委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我所的老领导、老专家自始至终给予了我们亲切的关怀、热情的鼓励和悉心的指导，全国各地的考古、文博单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大力的支持。在《中国考古学》付梓之际，我们向所有在本书编写出版期间，关心、支持、帮助过我们的同志们，向全国各相关兄弟单位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刘庆柱

2003年10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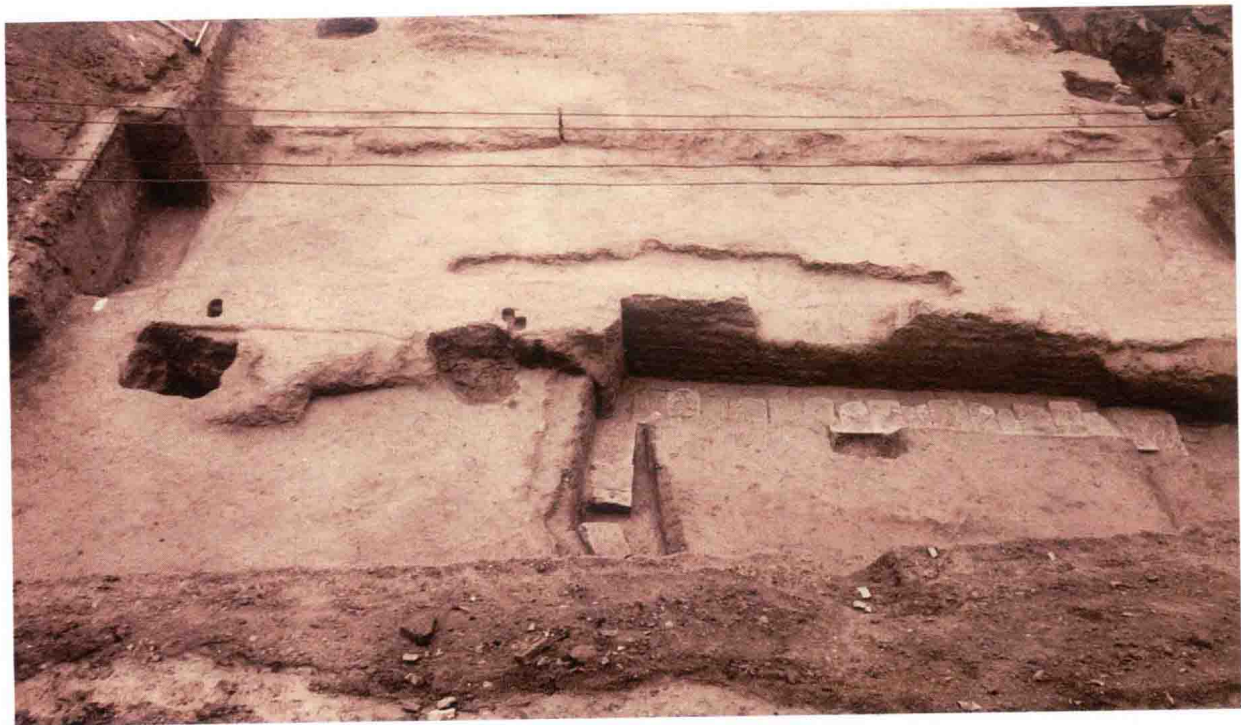
1-1 金虎台遗址



1-2 南城墙下潜
城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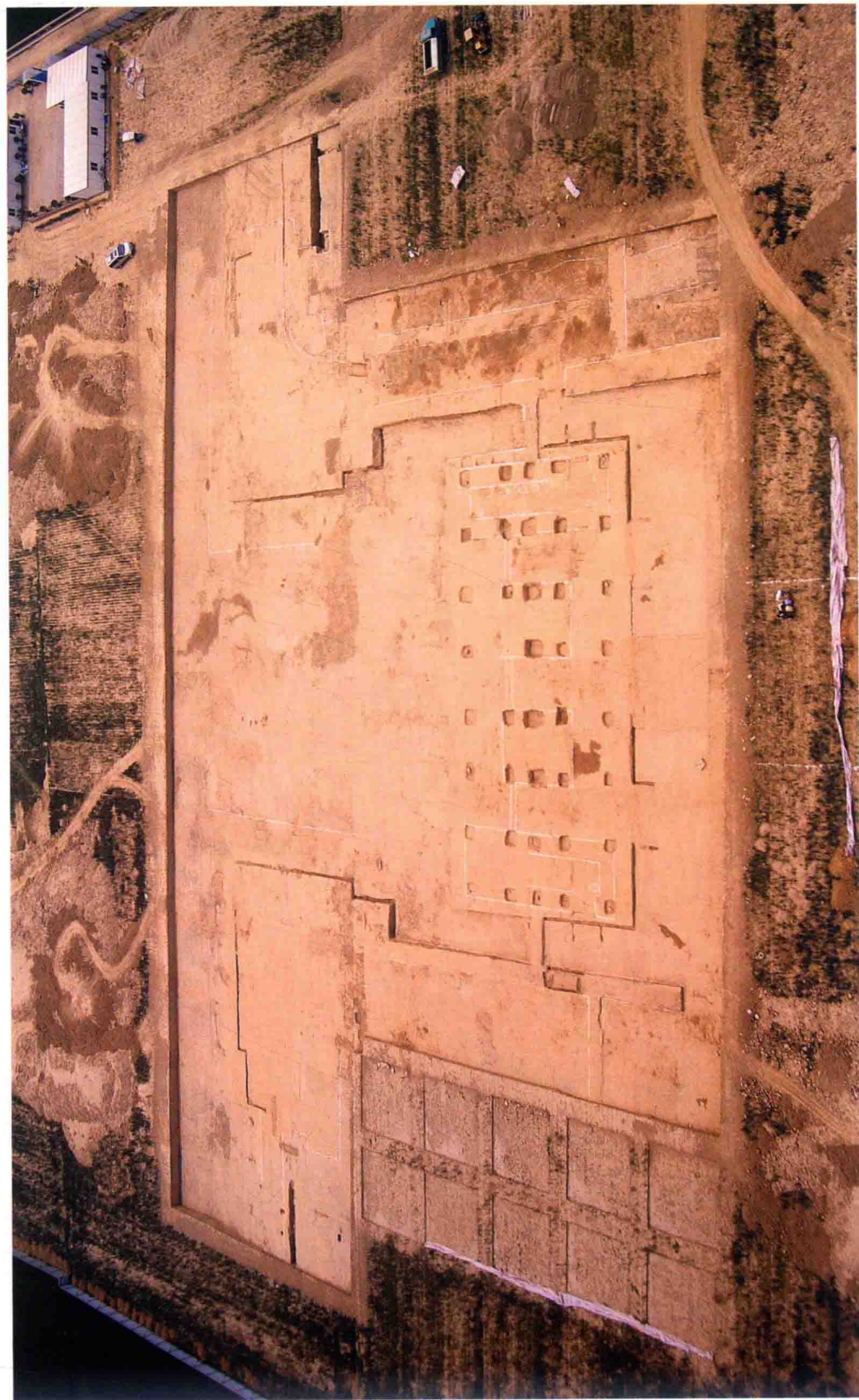
1-3 铜爵台遗址
出土石螭首



2-1 山西大同北魏明堂遗址西夯土台北半部遗迹



2-2 山西大同操场城北魏一号建筑遗址



3 北魏洛阳城宫城阊阖门遗址



4 北魏洛阳城建筑遗址概观